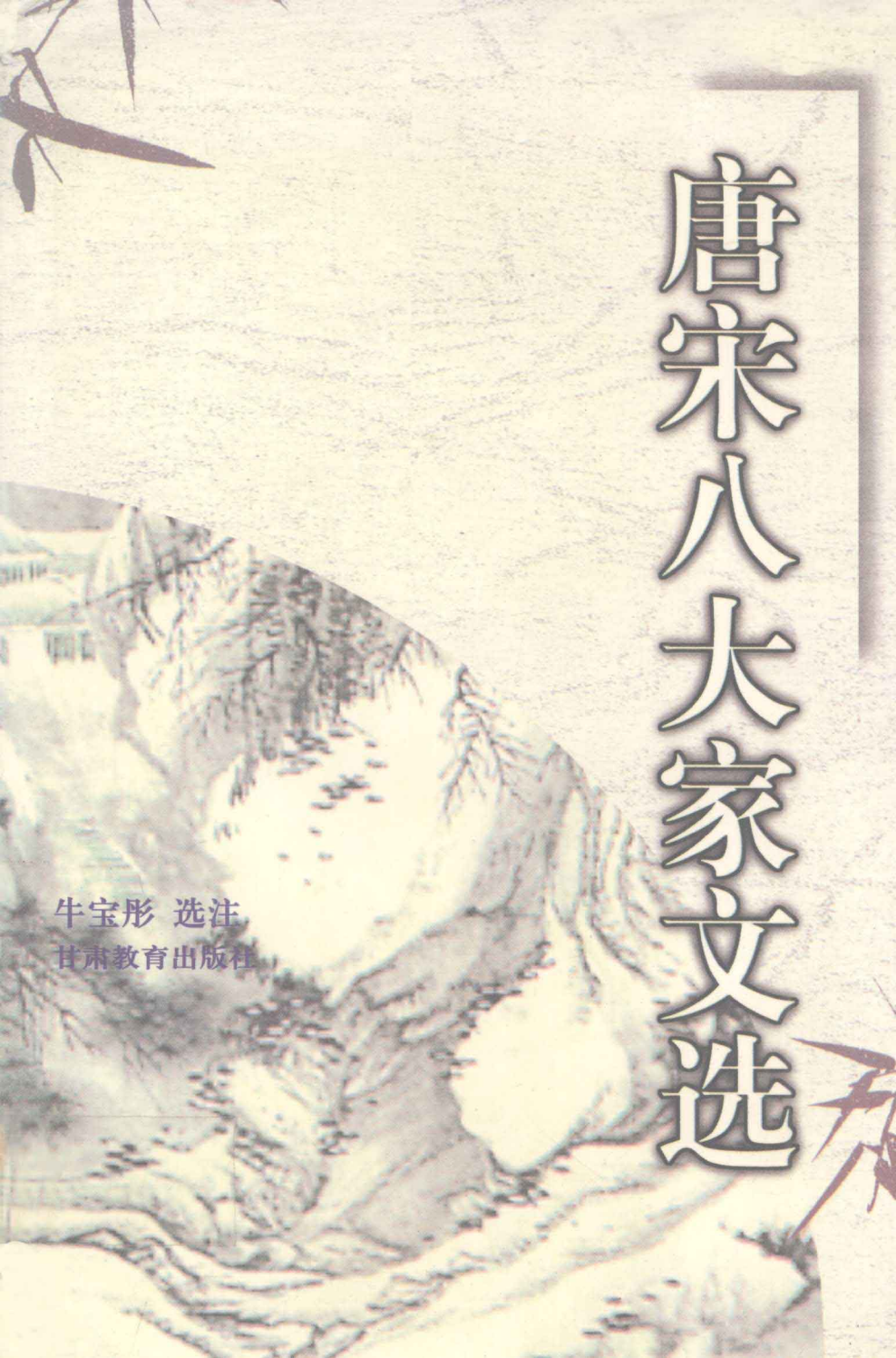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文选

牛宝彤 选注
甘肃教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文选

牛宝彤 选注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123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625 插页12 字数423,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

ISBN7-5423-0783-5/I·48 定价: 28.00元

牛宝彤，1937年4月25日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牛庄村。现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当代著名的唐宋文学专家和语言学家。发表有《清雄奔放李白文》等60多篇论文，出版有《三苏文选》、《李白文选》、《唐宋文学新论》、《古汉语组装语法》以及《作文学》等书籍（包括主编）33本。

序 言

一

“唐宋八大家”之名，最初是明朝初期朱右提出来的，他编选的《八先生文集》不传于世。明朝嘉靖年间，大古文家茅鹿门（即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八家文的最早选本。“唐宋八大家”之名，从此确立，并为大家所承认。“唐宋八大家”文的各种选本也陆续问世，如清代高塘《唐宋八家钞》、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以及清高宗（乾隆）的《御选唐宋文醇》（共选十家，以八家为主）等。但自“五四”运动以后直至现在，还没有一本新的“唐宋八大家”文的选本问世。我在教学中感到，编选一本供广大青年阅读，同时兼顾其他读者的雅俗共赏的《唐宋八大家文选》，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把自己十多年来学习和研究八家文的笔记加以整理成此册。

二

“唐宋八大家”的前两家：韩愈、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

倡导者。他们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散文复兴运动，史称“古文运动”。这场“古文运动”所以能够成功，是有它自身发展的因素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即：一、中唐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这场“古文运动”是中唐贞元“太平”时期和元和“中兴”时期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三、大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和作品对“古文运动”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下面分别简要论述。

我国的散文，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魏晋，形成了一种骈俪文体，六朝时极为兴盛，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当时叫“今体”，或“俪辞”。“骈文”的名称是从唐代柳宗元才开始叫起来的。他在《乞巧文》中说这种文体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简称“骈文”或“四六文”。骈，本义是二马并驾。《说文》：“骈，驾二马也。”“骈文”这个名称是很形象的。它要求句子对偶，四言六言相间作对，音韵也必须协调，并且注意音响和节奏，富于音乐性。这就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文学的艺术性能和技巧，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为我国古典文学宝贵遗产的一部分。但是骈文发展到后来，产生了极大的弊端，它的末流，无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堆砌华丽的辞藻，玩弄玄奥的典故，加多了音韵的限制，完全讲求形式，使这种文体萎靡和僵化，直接阻碍了散文的发展，以致非进行改革不可了。

远在南朝骈文鼎盛的时代，就有与之相对立的“复古”萌芽。梁朝的刘勰就已对骈文不满，在他所著的《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明道”的主张。公元六世纪中叶，西魏文帝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宇文泰（后来成为北周的开国皇帝）就用行政命令反对骈文，发出了以古文代替骈文的先声。柳庆用古文写贺表，苏绰模

仿《尚书》写《大诰》^{〔1〕}，北齐的颜之推也提出“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的主张^{〔2〕}。隋文帝杨坚下令反对骈文，李谔上书倡导“复古”运动^{〔3〕}。隋末王通在《王道篇》中说：“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反对骈文的思想是很明显的。公元七世纪末，武则天在位时，陈子昂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口号，被称为开创一代文风的先驱者。《旧唐书·文苑传》中说：陈子昂以后，“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之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相继提出古文改革的理论，特别是元结，在古文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陈子昂、元结等人的古文改革理论和实践为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启开了先河。

在骈文由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中，反对骈文的斗争是不断发生的，由古文代替骈文的一场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这说明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本身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韩、柳之前，反对骈文的人如此众多，都不能形成社会运动，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之外，主要是社会条件还不成熟。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的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当然也不例外，它正是它的时代、社会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的反映和产物。

安史之乱（公元755—762年）之后，进入中唐时期的唐王朝，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统治阶级内部，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大商人的矛盾也十分尖锐，主要表现在以太子李诵为中心的王叔文改革集团和大官僚集团、宦官集

团的矛盾。“永贞革新”就是这个矛盾的激化。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仍然严重存在,贞元(唐德宗李适的年号,公元785—805年)以来,朝廷采取“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的苟安妥协政策〔4〕,出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太平”局面。这个局面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有利于交通和商业的繁荣,城市人口有所增加,江南广大地区的生产发展很快,“江南居十九”的赋税有了保证,继而平定了一些叛乱的藩镇。这就使得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公元806—820年)年间出现了所谓的“中兴”局面。韩、柳的“古文运动”正是贞元“太平”和元和“中兴”的产物。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加强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一些有见识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打起“复古”的旗号,主张恢复儒家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古文运动”正是借助于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是为唐王朝恢复和巩固统一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同时“古文运动”也是当时城市经济繁荣的产物。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也需要一种切合实际的新散文形式。因此,“古文运动”一兴起,就得到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响应和市民阶层的拥护,形成了一个较为广泛的文体改革的社会运动。

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他们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都远远超过了他们以前的先驱者,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起了突出的指导和示范作用。这也是“古文运动”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政治上,韩愈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反对藩镇割据。柳宗元还能站在中小地主阶级革新派一边,参加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向大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展开斗争。在思想上,韩愈打着“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儒家正统,极力排斥佛老。柳宗元在“排斥佛老”上与韩愈相反,但在推崇儒道

上则是一致的。在文学上，他们反对骈俪空乏、束缚思想的“骈文”，提倡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型古文。“古文”这一概念是韩愈提出来的，它的含义是指与骈文相对立的、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取法先秦两汉文体而为当时社会现实服务的、单句散行的散文。所谓“古文运动”，也不单纯是“复古运动”，而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古文的传统，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一场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他们的古文理论是：第一，强调“文道统一”而以道为主。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道”，当然是指孔、孟之道。但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道”，泛指文章的内容；“文”，即文章的形式。文和道的关系，即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统一而以内容为主，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过分地强调所谓“道”，被后来的李翱所曲解，把古文变成讨论“道学”的刻板文字，滑到斜路上去了。第二，提出“惟陈言之务去”〔5〕，主张语言要创新，反对因袭陈词滥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过分的地方，例如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提出：“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这实际上是作不到的。后来，皇甫湜把古文要创新这一点发展到绝对化的地步，把“古文运动”引向斜路上去了。第三，提出“大凡物不平则鸣”〔6〕的论点，认为文章是不平者的呼声，文章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韩愈的很多文章，就是为他自己、朋友、门生鸣不平的，但只是鸣叫而已，不能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柳宗元进了一步，能为劳动人民鸣不平，如《捕蛇者说》，但“鸣”的目的则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最后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韩愈的古文独树一帜，是很有特点的。首先，韩愈很重视形象的鲜明和完整，创造了一些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张中丞传后

叙》就是突出的代表,其中写南霁云怒斥贺兰进明一段十分精彩: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仁,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

作者抓住人物典型的语言和行动,注意了细节描写和场面描写,突出了南霁云“勇且壮”的特点,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又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等,都塑造了不同人物的形象。其次,叙述与抒情紧密融和,是韩愈散文的另一特点。文章不是无情物,单纯地叙述是不能感动人的。韩愈在叙事中包含了深厚的感情。例如《祭十二郎文》,写得声泪俱下,凄楚动人。第三,注意文章的方法和技巧,例如在《原毁》一文中不仅熟练地使用对比的手法,而且把排偶的特点从句子扩大到段与段之间的相对和意义上的对比,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再如,韩愈为了纪念柳宗元,曾写了三篇文章:《柳子厚墓志铭》写死者的生平,深表同情之意;《柳州罗池庙碑铭》,写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深表敬重之情;《祭柳子厚文》则直抒胸臆,尽情赞颂。三篇文章写的是同一个人,但无一笔雷同。同一内容在不同体裁中,有不同的裁剪和处理方法,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第四,语言形象化、口语化。韩愈善于用比,并善于吸收群众口语,使文章生动形象。当然韩愈也有少数艰涩难

懂的文章，是不足取的。韩愈散文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他的论说文如《原道》等，更能代表他的作品气势磅礴、汪洋恣肆的风格。但由于韩愈思想保守、动摇，所以一些作品思想性不高，有天命论、有神论等封建毒素，是应该批判的。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封建社会里，一些封建文人把柳宗元说成“罪犯”，贬低了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卖身投靠“四人帮”的文人，硬把“法家”的桂冠扣在柳宗元的头上，过分夸大柳宗元的作用，甚至违背历史事实，硬说“古文运动”主要是柳宗元领导的，而把韩愈说成“儒家”，排斥在一边。这是不公平的。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柳宗元也提出过重要的古文理论，但主要的是以他典范的古文创作参加和领导“古文运动”的。由于他长期谪居边远地区，在领导“古文运动”方面虽不及韩愈，但就他的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来说，又是韩愈所不及的。

柳宗元的散文是丰富多彩的，他的论说文，表现了他进步的政治观点和初步唯物论、无神论的思想。著名的长篇论文《封建论》，针对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批判了分封制的反动性。《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和《送薛存义序》提出了“吏”是“民役”而不能“役民”的观点，这在当时封建社会里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与传统的“牧民”观点相对立的“民役”观点，却是难能可贵的。在《天说》和《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毫不客气地批判了韩愈的“天命论”和“史官危险论”。柳宗元和韩愈原是朋友，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经常同席同砚，互相学习。他们在一起共事，结成了朋友，韩愈有诗说：“同官尽才俊，偏

善柳与刘。”〔7〕在领导“古文运动”中，韩、柳也是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的。当韩愈写的《毛颖传》受到人们嘲笑非议时，柳宗元挺身而出为他辩护〔8〕；当韩愈提倡师道并自为人师而受到攻击时，柳宗元深表同情〔9〕；当韩愈向人推荐柳文，柳宗元却谦虚地回答说，韩愈的才学比自己高得多，只有司马迁可以相比〔10〕，意思是说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伟大的散文家。“韩、柳文墨相推轂”，一时传为美谈。但是，在政治态度和哲学思想上，两人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韩愈是“骑墙派”；在哲学上的观点，基本上是唯心论、天命论。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柳宗元却是毫不苟且，不留情面地给予批判。

柳宗元的《非〈国语〉》六十七篇，是些短小精悍的杰出的驳论文章。对《国语》一书歪曲了的历史事实加以驳斥，论点鲜明，笔锋犀利，一针见血。例如其中《戮仆》一篇：

晋悼公四年，会诸侯于鸡丘。魏绛为中军司马。公子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斩其仆。

非曰：仆，禀命者也。乱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贵，不能讨，而禀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后世多为是以害无罪，问之，则曰魏绛故事，不亦甚乎！然则绛宜奈何？止公子以请之命。第一段是《国语》的原文；第二段用“非曰”开头，标明是作者的批驳。晋悼公四年（公元前569年），公子杨干的战车冲乱了队列，魏绛却杀了杨干的仆人。《国语》以此标榜魏绛的军法严明，而柳宗元驳斥说，这样错杀无辜，并非军法严明。并且说明这样做对后世的影响很坏，进而指出魏绛应该采取的办法。文章语言简洁，层次分明，击中了要害。《非〈国语〉》一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国语》的批判，而且是对传统的观念及权贵们的挑战，表现了柳宗元非凡的胆识和才学。还应该指出的是，柳宗元把《国

语》比作“文锦覆盖的“陷阱”〔11〕，一定要揭露和批判，但在另外的场合却说“参之《国语》以博其趣”〔12〕，向人介绍该书的艺术特点。这正是柳宗元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批判、吸取的正确态度。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13〕。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写了不少游记，例如《永州八记》等，在山水的描绘中，融合了作者的感情，曲折隐约地反映出作者的影子；而且文句的优美，无与伦比。柳宗元可以说是郇道元之后，山水风景散文的大家。

柳宗元的寓言，独创一格，其特点是通过一个简短有趣的故事（故事里的角色不限于人，也许是鸟兽花木），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讽刺作用。寓言在我国先秦散文中已大量存在，但都是作为文章中的一个比喻出现的，很少独立成篇，而柳宗元则把寓言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大创造性的功绩。此外柳宗元的传记文学也是很有成绩的，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总之，柳文的成就是很高的，他的各种体式的散文都达到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糟粕，有时表现出悲凄伤感的情调，阅读时应注意批判。

韩愈、柳宗元顺应历史和散文本身发展的趋势，成功地领导了唐代中叶的“古文运动”。他们的散文不仅代表了唐代的散文的最高成就，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影响很大。但是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他们的继承者手里，受到了曲解，偏离了原来的方向，走上了斜路。以李翱为代表的一派，把古文变成了讨论孔、孟之道的道学说教，为宋代的道学开辟了道路；以皇甫湜为首的一派，片面强调“创新”，把古文运动引上奇异怪僻的狭窄道路，脱离了群众。只有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小品

文，继承了“古文运动”的传统，是晚唐时期“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14〕。但是，晚唐政局已不可收拾，儒学已失去号召力，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古文亦不免复趋衰落，而骈文又得以再度复兴了。

三

“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属于宋代，他们是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可见宋代散文繁荣昌盛的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的国家，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手工业生产和都市商业有所发展。在文化领域里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供上层统治阶级享乐并用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骈文和中小地主阶级及市民阶层所需要的古文同时并存。前者以“西崑派”为代表，这一派由十四个作家二百四十八首诗编成的《西崑酬唱集》而得名。这一派领袖是贵族、大官僚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他们“雕章丽句”、“更迭唱和”，统治文坛达三十多年，空洞浮艳的“时文”风靡一时。最先起来反对“崑体”、“时文”，提倡韩、柳散文的是柳开、穆修、王禹偁。他们发出了“古文运动”的先声，是宋代欧阳修领导的“新古文运动”的启幕者。宋代最高统治者，例如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出于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也连续下诏申戒浮华、提倡古文〔15〕，兴起了一场新的散文复兴运动。而欧阳修，正像当年的韩愈一样，处在前有先驱者后有响应者的关键位置上。欧阳修不愧为宋代的韩愈〔16〕，他从实际出发，顺应自己时代的政治经济的需要，以自己的古文理论和创

作，成功地领导了这次新的“古文运动”，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北宋著名的作家，如范仲淹、孙复、张景、宋祁、尹源、尹洙、石介、苏舜元、苏舜钦、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都投入了这场运动，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这是“新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有力保证。

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是：一、它是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唐代中叶“古文运动”的直接继续和发展。一开始，便提出了“宗唐尊韩”的问题，穆修校印韩集、柳集，并亲自到相国寺出售，说“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17〕苏轼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功绩，是百世之师〔18〕。欧阳修从小就热爱韩文，乞得一部破旧的《韩愈文集》，视为珍宝，伴随终生。他将韩集补缀校订，作为从事“新古文运动”的作家们的学习材料，“韩文遂行于世”，经历三十多年，“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19〕！最终确立了“新古文运动”继承和发展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即所谓“道统”、“文统”），为“新古文运动”找到了方向和依据。

二、在文道关系上，“新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接受了韩、柳的观点并加以发展，主张文道并重，以道统文，先道后文。针对当时“西崑体”的弊病，他指出“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而文不难而自至也”〔20〕。在他们的手里，“道”更趋于平实，“文”更趋于平易。

三、“新古文运动”不但反对骈文，而且反对自皇甫湜以来的艰涩怪僻之文。欧阳修吸取了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提倡写“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21〕的文章，他通过曾巩告诫王安石说：“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22〕

欧阳修本人也正是这样做的。苏轼称他“其言简而明，信而通”〔23〕。韩琦评他“得之自然。”〔24〕。

四、欧阳修还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的论点，进而提出了“穷而后工”〔25〕的论点，重视文学和现实的密切关系。

五、针对形式主义文风千篇一律的弊端，欧阳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要求作家要有个性特色以形成独特的风格。他说：“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26〕这对鼓励众多的古文作家，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努力创作自己具有个性特色的作品，以形成各自独有的艺术风格，起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新古文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指出：“风格就是人。”〔27〕我们大家常说“文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欧阳修等六大家就是各据个性特色并且形成各自独特风格的。

对欧阳修文章的总风格，苏洵评论说：“执事之文，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通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28〕这段评论是精当的。欧阳修这种平易自然、纤余舒缓、流畅婉转的散文风格，为宋代以后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欧阳修的这种风格体现在他的各体散文中。他的政论、史论、文论，有一定的战斗性，还有一部分记事、写景、抒情的文学散文，如《醉翁亭记》等，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艺术性较高。曾巩出于欧阳修门下，风格也最接近欧阳修。他发展了欧阳修从容舒缓、平易淡远的一面，作品的斗争性不及欧阳修、王安石那么强烈，但显得沉着稳重、古雅平正，而又委曲周全，布局严谨，层次井然，节奏舒缓，语言平实，给

作，成功地领导了这次新的“古文运动”，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北宋著名的作家，如范仲淹、孙复、张景、宋祁、尹源、尹洙、石介、苏舜元、苏舜钦、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都投入了这场运动，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这是“新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有力保证。

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是：一、它是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唐代中叶“古文运动”的直接继续和发展。一开始，便提出了“宗唐尊韩”的问题，穆修校印韩集、柳集，并亲自到相国寺出售，说“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17〕苏轼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功绩，是百世之师〔18〕。欧阳修从小就热爱韩文，乞得一部破旧的《韩愈文集》，视为珍宝，伴随终生。他将韩集补缀校订，作为从事“新古文运动”的作家们的学习材料，“韩文遂行于世”，经历三十多年，“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19〕！最终确立了“新古文运动”继承和发展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即所谓“道统”、“文统”），为“新古文运动”找到了方向和依据。

二、在文道关系上，“新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接受了韩、柳的观点并加以发展，主张文道并重，以道统文，先道后文。针对当时“西崑体”的弊病，他指出“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而文不难而自至也”〔20〕。在他们的手里，“道”更趋于平实，“文”更趋于平易。

三、“新古文运动”不但反对骈文，而且反对自皇甫湜以来的艰涩怪僻之文。欧阳修吸取了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提倡写“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21〕的文章，他通过曾巩告诫王安石说：“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22〕